

都市邊緣的陌生人

——農民工基督徒的信仰和社會生活

艾菊紅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博士

黃劍波

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講師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博士

隨着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發展，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尋求就業和生存的機會。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已經有一億多農村青壯年遷移到城市中。與此相應，佔中國基督教總數 80% 以上的農村基督徒也不可避免地捲入到城市化的巨大浪潮之中。

在城市中，這些農民工所從事的大多是城市居民不願承擔的各種危險、艱苦、沉重的工作，無論是從他們的身分還是從他們的工作上來講，這些農民工無疑處於城市生活的最底層，遭受着城市人的邊緣化與歧視。¹與此相應，

1. 有學者主張從四個層面去認識和界定農民工：第一是職業。農民工從事的是非農職業，或者以非農為主要職業，也就是說，他們的絕大部分勞動時間花在非農活動上，主要收入來自非農活動。第二是制度身分。儘管他們是非農從業者，但是在戶籍上還是農業戶口，屬於農民身分，與非農戶者有着明顯的身分差別。第三是勞動關係，嚴格地說，農民工不是僱傭者，而是被僱傭者，他們是被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外企老闆、鄉鎮企業、國有和集體單位甚至各種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僱去從事非農活動的，而那些自己不但不是被僱傭者、反而去僱用其他人的農村人口，不應屬於農民工。第四是地域，即他們來自農村。總之，農民工指被僱傭去從事非農活動、屬於農業戶口

在人數上佔農民工少數的農民工基督徒就更是這群邊緣人中的邊緣。當他們從鄉村來到城市，空間環境和文化環境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農民工基督徒的信仰在城市中必然要經受着社會文化的巨大衝擊。他們在城市中如何延續他們的信仰？他們的信仰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他們與城市教會和城市信徒之間的互動情況如何？這些都是我們所關注的問題。

要了解這些問題，就需要我們深入到這些從鄉村遷移到城市的農民工信徒中，進行深入的田野調查，如此我們才可能獲得鮮活的資料，才可能了解在城市中的農民工信徒的真實狀況。本文就是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對農民工信徒狀況的初步分析和討論，基本上仍屬「調查報告」的性質，旨在將此現象作一介紹，以引發更多深入的研究。²

一、農民工信徒的基本情況

1. 教會的選擇

要探討這個問題，首先要對中國鄉村教會的大致狀況有一個了解。鄉村教會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形態，一是在名義上屬於國家建制體系內三自教會的鄉村教會，儘管其管理、教導和運作實際上都有相當的自主性；二是和三自教會完全對立的鄉村教會。³分屬這兩種不同鄉村教會系統的農民工信徒到北京後尋找教會的傾向也不大相同。來自名

的農村人口。參見王春光，〈農民工：一個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階層〉，載《中國社會學網》（2005），<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jgyfc/P020050602397163905111.pdf>。

2. 這項調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參與北京三自教會活動的農民工信徒進行調查；二是對在北京的農民工自建教會的調查。兩項調查的時間都在一年多以上。調查主要採用了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方法，也使用了簡單的問卷等統計分析方法。本文的材料大多來自對三自教會的農民工信徒的調查，問卷調查的資料全部是來自對三自教會的調查，文中不再注明。

3. 見黃劍波，〈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基督教〉，見香港漢語基督教研究所編，《第三屆漢語基督教研究圓桌會議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義上屬於三自教會系統的農民工信徒到北京之後，首先選擇的是北京的三自教會；而屬於獨立鄉村教會系統的農民工信徒到北京後，一般不大願意選擇三自教會，而更願意選擇各種類型的家庭聚會。但不管分屬於何種類型的鄉村教會，要在偌大的北京城裏尋找教會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些信徒甚至花費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才尋找到屬於三自教會的教堂。而要尋找各種家庭教會或者聚會點更為困難，一則這些聚會點並不像三自教會有很明顯的建築標誌，如果沒有人帶領，人們根本不知道哪裏有聚會點；二來這些聚會點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基本上屬於半公開或非公開的，陌生人很難直接進入這些聚會點。所以，由於三自教會的可見性，它們成為很多農民工信徒進入北京之後的首選。

調查發現大部分信徒都更換過教會，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就近參與教會的活動。至於為甚麼選擇現在所在的教會，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過半數的信徒認為教會都一樣，在哪裏聚會都是敬拜神，這說明參與三自教會活動的農民工信徒的一個信仰理念，認為神的教會都一樣。也就是說，這些信徒基本上對於教會之間的差異，以及教會之間神學上的差異並不十分關注。有一些信徒參與兩個以上教會的活動，他們一般在三自教會參加主日禮拜，或者參加青年聚會，在家庭教會參加查經班或者禱告會等小型聚會。至於最終選擇在三自教會參加活動的信徒自己所給出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擔心家庭教會存在異端；二是比較反感聚會點對於三自教會的不滿；三是對於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區別沒有概念，所以對家庭教會對於三自教會的一些看法感到困惑，在沒有辦法辨別的情況下，他們大多還是選擇了三自教會。

2. 參與教會活動的情況

就我們主要調查的北京崇文門堂和珠市口堂來看，兩個教會都沒有對信徒的來源做過登記，而且到教堂的人員流動性非常強，所以我們無法得知在這兩個教堂參與教會活動的農民工信徒的具體人數。但是我們從二〇〇四年到二〇〇六年復活節為止在崇文門教堂受洗信徒的統計資料來看，在三次洗禮中，外地受洗信徒分別佔到受洗信徒的 56.5%、43.2%、55.65%。在珠市口教堂二〇〇五年復活節、聖誕節和二〇〇六年復活節三次受洗的信徒中，外地人佔受洗人數的比率分別為：68.9%、65.31%、69.1%，佔到受洗人數的三分之二強。儘管這些外地信徒並非全部來自農村，但從這些數據中我們還是可以推出農民工信徒佔有相當比例。

除了參與星期天的主日禮拜，農民工信徒也會參與各教堂在其他時間的各種小型聚會，比如禱告會、查經會、姊妹會和青年聚會等。特別是參與青年聚會的農民工信徒人數比周日聚會更多。青年聚會的時間都在晚上，這樣有些農民工信徒因為工作的緣故，沒有辦法在周日參加主日禮拜，只能在下班以後參加青年聚會。至於周日的聚會，只在有時間的時候才會來，所以青年聚會中也常常會看到一些年齡比較大的信徒。也有一些信徒是因為青年聚會人數相對較少，可以和其他信徒有更好的交流而放棄周日的主日崇拜，只參加青年聚會。

問卷調查顯示經常有規律參加教會活動的信徒佔 64.8%，⁴即便是工作與教會的活動有衝突，他們一般都會想方設法參與教會的活動。在一家飯店做幫工的信徒SJK說：「一

4. 研究者本來計劃在崇文門教堂和珠市口教堂，主要針對參加教會各種聚會的農民工信徒，各發放 200 份問卷，最後實際發放了 296 份，回收有效問卷 142 份。儘管樣本量很小，有效回收率也比較低，難以作為有效分析的可靠依據，但仍然可以說明一定的問題。關於問卷本身，研究者設計了 40 個問題，基本上涵蓋了農民工信徒可能會面對的各種問題。

個月休息兩天，我就分成四個禮拜五下午休息。」⁵這樣安排時間可以使他能夠參加周五晚上的青年聚會。也有一些信徒因為工作與聚會時間衝突，甚至會為此而換工作。由於時間上的原因，這些農民工信徒基本上都是只選擇其中的一個聚會，多是主日禮拜或者青年聚會，其他的聚會參與得相對較少。對於大部分信徒來說，不僅僅是工作的原因，居住的地方距離教堂較遠也使很多信徒無法參與更多的教會活動。

除了參與教會的各種聚會以外，也還有一少部分農民工信徒會加入到教會的義工組織，為教會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崇文門教堂的 300 多名義工中，絕大部分是外地人，而且這些義工受教育的程度相對較高。問卷調查的資料顯示，在 49 位參與教會事奉的信徒中，只有 8 位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其餘的都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而且絕大部分為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的原因後文會談到。

3. 奉獻情況

農民工信徒奉獻的形式差別很大，大致可以分為四種情況：

(1) 在家鄉接受福音，並在家鄉教會接受牧養時間比較長的，一般是把奉獻給家鄉教會，比如買東西，或者直接給錢。

(2) 在北京接受福音的，一般是在北京做奉獻，有時候也會給家鄉的教會做奉獻。

(3) 還有一些信徒對於奉獻的問題並不十分清晰，他們的奉獻比較隨意，而且帶有很強的功利性色彩。

5. 在個人訪談方面，研究者採用隨意抽樣和「滾雪球」的方式，共深度訪談了 33 名信徒，另外還對 10 多名信徒作了一般性的訪談。

(4) 還有很大一部分農民工信徒則認為北京的教會太富有，所以不大願意在北京奉獻，而是奉獻給家鄉的教會。

總的來說，大部分農民工信徒的收入很少，很多時候只能維持他們的基本生存，所以奉獻也非常少，甚至完全沒有奉獻。問卷的情況顯示，農民工信徒每個月用在奉獻和購買基督教資料方面的費用絕大多數在 100 元以下。當然也有一些農民工信徒的收入頗豐，所以偶爾會有一些做生意的信徒奉獻上萬元的款項，然而這種情況只有有限的幾起。

4. 信仰及信仰的轉變

儘管在北京三自教會參與聚會的農民工信徒基本上來自農村的三自教會系統，但是農村的三自教會與北京的情況存在相當大的差異。無論從信仰的認識方面、還是教會活動的形式方面，這些從農村來的信徒到城市之後，都會感受到強烈的反差，他們的信仰也在逐步發生着改變。

單從信仰的角度來講，與城市信徒相比較，農民工的信仰似乎更為單純，也更為熱心，非常「追求」。在教會活動的時候，經常看到他們積極主動地回應講道人，經常會在講道間隙回應「阿們」、「哈利路亞」等，神情也較為專注。就參加教會義工的農民工信徒而言，他們的服務比城市的義工更為主動和熱心。

但是農民工信徒的信仰往往帶有很大的實用性和功利性，他們把信仰作為在城市生活中保平安，保證生存的必要手段。很多見證都是講上帝如何保佑他們平安，如何保佑他們有足夠的收入。教堂的教牧人員也說，農民工信徒常因疾病或具體困難，請求教牧人員為他們禱告，對信仰的理解功利色彩更多。所以他們在講道的時候也更願意聽

見證和那些與具體的生活聯繫比較緊密的內容。問卷調查也顯示有 50.7% 的信徒要求講道要貼近生活。

這些從鄉村來的信徒往往也會把家鄉教會的一些形式傳達到北京的教會中。中國農村教會的狀況非常複雜，信仰上可謂五花八門。對他們來說，基督教究竟是甚麼，基督教的教理和教義究竟是甚麼，他們的了解並不多，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信仰混亂。農村的教會往往會把民間信仰中的各種巫術活動帶入到基督教信仰中來，這種信仰狀況自然也會被農民工帶到城市教會中來。

另一方面，當這些從鄉村來的信徒試圖影響城市教會的同時，城市教會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他們。我們所有的訪談對象都認為家鄉教會的敬拜氣氛過於隨便，秩序混亂，沒有北京的教會莊嚴肅穆，有秩序。當他們參與城市教會活動一段時間，再返回家鄉參與家鄉教會的活動時，突然發現自己已經不能適應家鄉的教會了。有位信徒說：「現在我在北京聽慣了，回老家聽不進去了，特別膚淺。」

很多農民工信徒會把在北京教會聽到的信息傳遞回家鄉，把北京教堂裏的書以及音像資料等帶回家鄉，有些還把北京教會的管理模式反饋到家鄉的教會。還有一部分農民工信徒是在北京皈依的，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在北京的教會中接受信仰的熏陶，接受過一些基督教基本教義的培訓。如此，他們的信仰根基就較少受到鄉村教會中各種民間信仰形式或因素的影響，相對而言對於基督教教義的理解更為貼近「正統」。所有這些其實在一定程度上都對鄉村的教會起着一定的影響，在北京的教會聽到的信息也有助於農民工信徒辨別家鄉教會中與民間信仰相結合的一些可能違背基督教教義的東西。當然，返鄉信徒對家鄉教會的影響非常微弱，對鄉村教會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不會起

到多大作用，但是畢竟有了這樣一個信息傳遞的管道。

隨着農民工信徒參與城市教會的活動逐漸增加，他們對於信仰的看法和態度也會漸漸發生改變。當然因為城市生活的巨大壓力和他們惡劣的生存條件，以及相對較低的受教育程度，使他們難以從信仰的功利性和實用性中擺脫出來。話又說回來，即使是城市信徒，其信仰的功利性和實用性也相當強。但是畢竟因為教會的講道，以及和城市信徒的交流，與在家鄉相比較，他們多少開始理解基督教的教義。教堂的教牧人員也向筆者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在北京時間比較長的一些農民工信徒，在和教牧人員交流的時候，更多的會談到生命的成長，實用的色彩要少一些。

二、信仰與農民工信徒的城市生活

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市之後，他們所面臨的首先是生存問題。儘管城市的發展離不開這些農民工的貢獻，然而他們卻免不了在繁華的都市中遭受着城市人的歧視，甚至是某種程度的壓迫。隨便打開一張報紙或者一個網站，都會看到種種關於農民工討薪的報道，他們為了討回自己的血汗錢，付出的甚至是血的代價。種種社會不平等因素造成了社會道德的急劇敗壞，原本一些淳樸的農民在城市生活中被物慾所驅使，採取各種非理性的、甚至是犯罪手段以達到能夠致富的目的。在這樣的環境中，農民工基督徒持有的是甚麼樣的生活態度？又是如何處理這些事情的？

面對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難：他們相信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在看顧着他們，所以在面對艱苦生活的時候，往往能比較坦然地面對。一位在北京以蹬三輪車謀生的信徒說，在他的家庭遇到極大困難的時候，「沒有道路的時候，只有仰望神，神給我開出路。」

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每一位訪談對象都會向筆者講述他們各種各樣的見證。最後都會歸結到，一切困難都是上帝幫助他們解決，就像一位信徒說的「上帝會安排」。在面對困難的時候，因為有「信靠」，有「安慰」，所以他們能夠「坦然無懼」地面對一切困難，心中那份「喜樂」與「和平」並非強做出來，而是真正有了依靠的那種安詳與平和。其實在他們身上也就印證了，「宗教的現實意義既在於通過強調罪與拯救之間的掙扎來解釋生命，也在於支持脆弱的身分和少有特權的那些人。」⁶

我們的所有受訪者在遇到困難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向上帝禱告。問卷調查的結果也表明，認為基督教信仰對信徒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非常重要的佔 77.6%。然而有意思的是，大部分農民工信徒說，他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並不傾向於找教牧人員或者信徒幫助，一般只是向上帝訴說。一位信徒的話比較有代表性，「我不會找其他的弟兄姊妹交流，因為自己的事情，很少跟別人說。遇見甚麼事情都是禱告。」其中的原因可能比較複雜，如果要進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還需要做進一步的調查。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這些農民工信徒可能內心存在着一定的顧慮，和城市教會及信徒之間存在着一定的隔閡。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從另一個側面可以反映出，信仰在這些農民工信徒的生活中，他們在乎的是心中所信靠的「上帝」，而不是其他的「人」，即便是作為教會牧養的「牧師」也不例外。

面對誘惑與罪：⁷北京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繁華的都市生活使那些剛剛離開鄉村來到北京的農民工眼花繚亂，

6. 轉引高師寧，《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宗教社會學個案研究》（香港：道風書社，2005），頁 201。

7. 這裏的罪指基督教教義中的罪，並非法律意義上的罪。

人的慾望開始無限膨脹。而這些農民工信徒，因為信仰的緣故，經常會省察自己的行為是否與《聖經》上的要求相一致。儘管生活上的困窘也常會使他們作出一些不恰當的行為，但是他們往往能夠反省自己的行為。與沒有信仰的人相比，他們相信自己的行為時刻都在神的眼目之下。據前面那位蹬三輪車的信徒講，他也曾經做過其他工作，但最後選擇蹬三輪車的原因是為了遠離謊言。

另一位在建築工地做木工的信徒說：「感謝主，他們去那不乾不淨的地方，感謝主，我沒有去。他們不信主的，去美髮廳啊，我都沒有去。他們叫我去，我都沒有去，我在家看《聖經》。賭博我從來沒有去過，不抽煙。」

當然並非所有的農民工基督徒都會按照《聖經》上的教導去做，畢竟生活對他們來說十分不易，當他們的行為與信仰發生衝突時，很多人也會猶豫。

工作中的信仰：所有採訪過的信徒，無論是自己做生意，還是在工作單位，大部分人都會公開自己的信仰，而且很注重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在工作中注意自己的言行，時刻在提醒自己「我是一名基督徒」。有些信徒很明確地說，別人能夠感受到他是基督徒，無論是心態的平和，為人處事的態度，對待工作的態度等等，總有一些方面讓人覺得他和非信徒不一樣。

在與同事或者客戶等相處的時候，他們也會儘量注意自己的言行。YL先生是做裝修的，他說：「在跟客戶打交道的時候，……活做完以後，他感覺挺滿意，挺舒服的，我會告訴他們（我是基督徒）。起碼來說他們感到滿意，做得認真。去買東西的時候，不吃回扣。」

正是因為這些信徒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彰顯出來的信仰的力量，給一些非信徒作出了榜樣。有位做糧油生意的

信徒告訴筆者，她的皈依完全和她的一個客戶有關係。正是她的客戶溫柔謙卑的行為感動了她，從而使她最終皈依。

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農民工信徒的自信心相對來說比較強。一般而言，到城市來的農民工都有強烈的自卑心，特別是在城市人的白眼下，他們時刻感受到自己是與城裏人不同的二等公民。在農民工信徒身上這種自卑感相應來說就要少一些，這與基督教教義所宣揚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教導有着極大的關係。另外，《聖經》中關於耶穌基督卑微的出身和貧窮的形象，以及《聖經》中輕看世上的地位、財富，注重天上的榮耀的教導深刻地影響着他們。在和這些信徒做訪談的時候，研究者能明顯地感覺到他們的自信。

三、農民工信徒與城市教會及城市信徒的關係

這是研究者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城裏人」和「鄉下人」這兩種稱呼的含義非常複雜，並不單純是一個居住空間上的劃分。當這些鄉下人來到城市之後，明顯的和城裏人有着隔膜。城裏人看不起鄉下人，認為是鄉下人弄髒了城市，擾亂了社會治安，使城市擁擠不堪；而鄉下人也在城市人的白眼中產生了對城裏人的敵對情緒。那麼這種狀況是否也反映在教會中呢？農民工信徒和城市信徒之間會不會也有對立的情緒？他們是否能很順利地進入城市的教會呢？進入之後和城市教會的關係又如何呢？

基督教的教義宣揚所有的信徒都是弟兄姊妹，都是主內的肢體，但事實上這只能說是理想的形態。很多農民工信徒表示，他們在三自教會中很少和其他信徒交流，在教會的活動也就僅限於聽聽道而已。研究者問一個信徒在北京和其他信徒有沒有接觸，他的反應表現得很強烈：「接

觸？一個也沒有，我現在覺着可孤單哪。……在這兒也很少跟人交通，⁸聽完道，找人禱告禱告就走了。」

這位信徒的狀況代表着相當大一部分農民工信徒的狀況，甚至有些在北京很多年的信徒也仍處於同樣的狀況：

「北京的大教堂就是那樣，進去了就出來，我都在北京十年了，很少認識甚麼人。跟姬姐妹他們認識，我就感覺她們畢竟是北京人嘛，好像……」

儘管這位信徒沒有明確說出後半句話，其含義不言而喻。很多信徒普遍反映北京的信徒沒有家鄉教會的信徒熱情，總覺得和他們存在着隔膜，有些信徒甚至說北京信徒沒有愛心。

我們的問卷調查顯示，農民工信徒最強烈的要求就是希望能與教牧人員接觸，也就是說他們的屬靈生命處於饑渴的狀態。其次是希望講道能貼近生活，有些信徒提出建議，講道要儘量簡單，讓文化程度低的人明白。再次就是希望教會的接待能夠熱情，信徒之間要多加交流，相互關愛。

所以有這樣的狀況，其中的原因很多。以研究者的分析，大概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首先是生活習慣上的原因。城市信徒和農民工信徒的成長背景差異極大，不同的生活習慣使信徒之間會有各種小的摩擦。有一段時間崇文門教堂的廁所經常被堵，這種狀況持續了好幾個月，原因是一些從農村來的信徒不會使用沖水廁所。於是城市信徒就認為一些從農村來的信徒不遵守教堂的規定，而農村信徒覺得北京的信徒看不起他們。

其次是受教育背景的不同。北京三自教會的講道很少針對具體問題，更多的是針對生命的成長來進行教導。另外有些教牧人員的講道神學色彩過於濃厚，很多農村來的

8. 「交通」是中國基督徒的用語，意指基督徒之間的交流和分享。

信徒根本沒有辦法聽懂，也使農村信徒覺得沒有辦法融入教會。相對而言，同樣來自農村，但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信徒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就比較少，而且他們認為在教會中基本上不存在與人交往的隔閡，相互之間的交流非常融洽。這也就是在教堂做義工的農民工信徒多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一個原因。

再次，與個人性格有關係。前述那位在北京十年而很少和其他信徒溝通的信徒，其性格相當內向。而在青年團契中比較活躍的 YL 則是性格非常外向的人，經常會在小型聚會上主動要求唱讚美詩。

第四，在教會中，教會的教牧人員、義工、信徒等對待農民工信徒的態度確實存在着一些問題，研究者就曾經親眼看到過幾次教會義工、甚至是教牧人員對信徒態度粗暴的行為。有一位農民工信徒在跟研究者談到她在城市教會的遭遇時流下了眼淚。

第五，信徒之間的交流與溝通不好是三自教會的一大問題。不僅是農民工信徒很難和其他信徒相互溝通，就是北京的信徒相互之間的溝通也不好。像崇文門教堂這樣的大教會，每周都有三千多人來此聚會，如果不主動與人溝通，信徒之間相互認識的幾率就相當小，大多數人都是來去匆匆，僅限於在教會中聽道而已。

第六，城市生活本身的隔膜也造成信徒之間的隔膜。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有很大的不同，在鄉村十裏八鄉的人基本上都會認識；而在城市，即使住在對門的鄰居，不相識的情況比比皆是。天南海北的人全部聚集在城市中，社會的缺乏誠信，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等等問題都會帶到教會中來，自然反映在信徒的身上。另外在城市的生活比較緊張，相互之間見面的機會很少，自然缺乏交流。

四、農民工信徒的網絡關係

農民工離開了原來的鄉村，同時也就脫離了原來的社會關係網絡，也就是說他們傳統的「社會資本」必然要遭到巨大的衝擊、破壞，然後在城市中重新組合，形成他們新的社會關係網絡，構成新的「社會資本」。⁹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在進入城市之初他們原有的社會網絡關係就已經不存在，相反正是由於他們傳統的社會關係網絡得以維繫，他們才來到城市，並在城市中得以生存和發展。根據對北京浙江村的研究調查，浙江人進入北京依靠的就是傳統的社會關係網絡，逐漸發展成為北京最大的移民聚居區之一。¹⁰

對於農民工基督徒來說，他們從農村來到城市，也同樣離不開傳統的社會關係網絡，他們也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利用着傳統的血緣和地緣關係，但他們比非基督徒又多了一個關係網絡的渠道，那就是信仰，他們能通過信仰在基督徒之間建立起網絡關係。我們這裏從兩個方面來探討農民工基督徒的網絡關係：

1. 農民工信徒皈依過程中的網絡關係

宗教社會學家斯塔克（Rodney Stark）對早期基督教歷史的研究指出，基督教興起的一個方面就是靠業已存在的社會網絡發展的，在大流散時期的猶太人，正是由於那些是他們親屬或者朋友的猶太傳教士從耶路撒冷把基督教帶給他們，使他們皈依基督教。¹¹對於在北京皈依的信徒來說，當他們來到城市之後，傳統的社會關係網絡會在他們

9. 按照斯塔克（Rodney Stark）的解釋，社會資本由人際依戀構成。

10. Li Zhang,《城市的陌生人——人國流動人口中空間、權力及社會網絡的重構》（*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頁17。

11. 斯塔克著，黃劍波、高民貴譯，《基督教的興起：一個社會學家對歷史的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68。

皈信基督教的時候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時新建立的社會關係網絡，如行業、友誼等等，也都會在農民工信徒的皈信過程中起到與傳統社會關係網絡相似的作用。

我們的調查發現，在家鄉皈信的信徒多於在北京皈信的信徒，在訪談資料佔 63.6%，在問卷調查中佔 56.25%，當然因為調查的局限性可能實際情況會有出入。在北京皈信的信徒中有一部分人，實際上在家鄉的時候對基督教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只是到北京以後才明確接受了信仰。問卷顯示，在家鄉從來沒有接觸過和從來沒有聽說過基督教的佔 15.5%，也就是說大部分人在家鄉的時候就對基督教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他們很多是通過家人、親戚、同鄉、同事等等的帶領來到教會。

SJJ 女士在來北京之前，她的母親就一再勸告她到北京以後要找教會，到北京後她因為生活壓力接受了信仰。LH 女士和 SJJ 女士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朋友，SJJ 女士皈信之後，就向 LH 女士傳福音，於是 LH 女士在 SJJ 的影響下也接受了福音。LGL 女士的皈信則是同在一個市場做生意的合作夥伴傳福音給她。也就是說，這些人的皈信都是通過社會關係網絡，親屬（包括血親和姻親）、同鄉和在城市中建立的行業上的關係皈信的。

農民工信徒皈信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的是社會關係網絡，當社會關係網絡失去的時候，皈信和信心的堅固都不大可能實現。這從中也可以印證斯塔克關於社會資本的概念，也就是說當人們接受宗教的時候，通常會考慮到社會資本，「通過留在所依戀的人的信仰之內，一個人便可以保留其他人的好感而最優化社會資本。」¹²我們以在XH美

12. 斯塔克、芬尼著，楊鳳崗譯，《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 149。

容院皈信的W女士為例，她在家鄉從來沒有聽說過基督教，進入XH以後，由於所有的員工都是基督徒，受到大家的影響，W很快就接受了信仰。但是當XH美容院的基督徒逐漸流失以後，再進來的員工不可能接受福音，剛剛接受福音的店員，很快也就失去了信心。

由於城市與鄉村的巨大反差，在城市生活的壓力，以及他們在城市中的處境，使農民工需要尋找一個依靠，而基督教特別強調的是「信靠」上帝，「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¹³這樣一種宗教就給予他們想要的，因為本來中國的農民就不是無神論者，只是信仰上更為實用性罷了。對他們來說，哪個神更大、更靈，他們就信仰哪個神。基督教所宣揚的上帝是「獨一的真神」，這恰好就滿足了他們需要。特別是當他們在北京遇到種種困難的時候，當別人傳福音給他們的時候，他們希望這真的就是他們的依靠。

這些在北京皈信的信徒，他們的皈信經歷大多也是因為疾病或者其他苦難等等因素，與在家鄉皈信的信徒在皈信經歷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當他們皈信之後，經歷了病得醫治，困難得以解決等等「神蹟」，他們的宗教資本得到積累，信仰也就慢慢堅固下來。斯塔克的兩個命題有助於解釋這種現象：「對於宗教解釋的信心會隨着歸功於宗教的神蹟而增強」；「對於宗教解釋的信心會隨着人們有神秘體驗而增強」。¹⁴有些信徒特別強調他們確實是真正經歷了神之後，¹⁵信仰才最終堅固下來的。

13. 《馬太福音》十一章 28 節。

14. 斯塔克、芬尼著，楊鳳崗譯，《信仰的法則》，頁 135-136。

15. 經歷神就是禱告得到回應，當時遇到的困難能順利解決等。

2. 皈信之後通過教會建立的網絡關係

當這些信徒皈信之後，他們必然要參與各種各樣的教會活動，在教會活動中他們慢慢會通過信仰建立起新的社會關係網絡。這擴展了他們在城市中的關係網絡，當然也會在城市生活中提供一些實際的幫助。在調查中，一些從事美容和按摩行業的農民工信徒之間的關係令研究者感到驚訝，研究者所遇到的做按摩或者美容行業的信徒（有些是很偶然相遇的），他們相互之間都有聯繫，相互介紹工作，一起租住房子等等。

不過我們的調查顯示，幾乎所有的訪談對象都說很少受到其他基督徒的幫助，或者根本沒有受到過其他基督徒的幫助。問卷則顯示，認為受到幫助很多的佔 27.2%，比較多的 20.8%，不多的 33.6%，沒有受到過基督徒幫助的 18.4%。從問卷信息看，認為自己受到其他基督徒幫助比較多的人和基本上沒有受到過其他基督徒幫助的比例大致相同。這一問題同時也表明了信徒之間的交往並不是特別多，所以相互之間的聯繫也不大緊密。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基督徒在整個社會中的人數還是非常少，職業種類千差萬別，造成人們之間不大容易建立起網絡關係。而且如前所述，在三自教會中信徒之間的交流並不多，也是原因之一。

斯塔克和芬尼（Roger Finke）認為，「堂會越大，群體內部的社會網絡密度越低」。他們研究得出，在一個 50 人的堂會中，有 1225 個可能的二人關係，在一個 100 人的堂會中，這種二人可能關係就會有 4950 個，在 400 人的堂會中，就是 79800。¹⁶按照這個社會學命題進行推算，在崇文門教堂這樣一個 3000 人的教會中，信徒之間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的幾率是比較小的。這也就引出斯塔克和芬克的

16. 斯塔克、芬尼著，楊鳳崗譯，《信仰的法則》，頁 196。

另外一個命題：「一個堂會內部網絡密度越低，增強委身的平均加固程度越低。」¹⁷這是我們在下面要探討的問題。

五、農民工信徒在都市生活的出路：農民工教會？

當研究者剛開始進行這項調查的時候，一直有這樣一種看法，三自教會由於其可見性而成為農民工進入北京之後一個較好的選擇。然而隨着調查的深入，研究者發現問題遠非想象的那麼簡單。這些農民工信徒很難融進北京的三自教會，他們雖然來參與教會的活動，有些甚至堅持每周都來，但是他們實際上仍然游離在教會之外，和其他信徒沒有多少交往，和教牧人員也沒有甚麼接觸，他們基本上處於一種無人牧養的狀態。三自教會數量眾多的信徒，連原來的信徒教牧人員都沒有辦法很好地牧養，遑論這些大量湧入城市的農民工信徒。教牧人員無暇顧及這些農民工信徒，信徒之間也沒有辦法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教牧人員也對此十分無奈，儘管知道教會中有大量的農民工信徒，然而人手實在不夠，他們沒有辦法對這些信徒進行額外的關照。所以這些農民工信徒在城市教會中通常會有一個信仰的低潮時期，也可能存在着信徒流失的現象，這也就是說，他們對於宗教的委身的加固程度降低了。然而在北京這樣一個大都市中，農民工信徒所面臨的問題比在鄉村的時候要多很多，不單純是生存的壓力，他們可能還要應對來自各方面的歧視，面對生活巨大落差所產生的各種心理問題等等，可這些都促使他們需要靈性上的關懷，需要有一個安撫心靈的場所。

那麼這些農民工信徒的出路在甚麼地方？隨着問題的出現，農民工本身也在思考，也同樣在尋求着出路。他們

17. 同上，頁197。

需要適合自己的教會，也在想方設法地尋找適合他們的教會。調查資料顯示，絕大部分農民工信徒都參與過家庭教會的活動。然而城市的家庭教會也不見得是他們最好的去處，儘管人數較少，他們可以和這裏的信徒有着良好的溝通渠道，然而成長背景的差異，生活習慣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差別，都使得他們也難以真正進入到城市的家庭教會中。¹⁸

於是農民工信徒自發組織的一些聚會活動出現了。一些信徒居較集中，他們自發組織在某位信徒的家中舉行各種聚會，開始的時候只是查經班，禱告會之類，慢慢地也開始有了主日禮拜。研究者曾經到過北京通州區的一個家庭聚會點，因為在這個家庭聚會點聚會的信徒居住得離教堂比較遠，他們就向通州教堂提出要求，並開始在一位信徒家裏聚會，通州教堂也偶爾會派教牧人員到他們的聚會點講道。這種聚會點相當開放，只要是信徒他們都歡迎，所以人員組成相當複雜，參與聚會點活動的二十多名信徒中，既有北京本地人，也有外地來的打工者；年齡差異也很大，從二十多歲到六十多歲都有。當然這種聚會點還在形成初期，很不成熟。研究者的受訪對象也有不少人參與類似的聚會點的活動，可見這類聚會點在北京為數不少。還有一種類型的聚會點，是由來自同一地區的信徒組織起來的，與三自教會有來往，希望能夠得到三自教會的支持。在珠市口教堂參與聚會的一些溫州信徒，因為工作的原因沒有辦法在白天到教堂來參與活動，曾經要求珠市口教堂專門在晚上為他們這些溫州信徒開辦聚會，以滿足他們的需要。根據珠市口教堂的牧師介紹，因為各種原因，這些溫州信徒的要求沒有辦法滿足，後來他們在教堂之外

18. 可參見黃劍波，〈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基督教〉。

開設了自己的聚會點。北京另外一個教堂專門為一些溫州信徒開設了一個聚會點。因為種種原因，研究者沒有辦法對這一聚會點進行採訪，但是通過與該教堂一位教牧人員的電話聯繫，還是得到一些信息。首先是這些溫州信徒在參與教堂的聚會時，感到語言障礙；其次，教堂的敬拜儀式與他們的敬拜習慣不一樣，比如他們禱告的時候要跪下等等；再次，因為這些溫州信徒大部分是以家庭為單位參加聚會活動，也造成了他們參加教堂崇拜的困難。所以教堂為了滿足這些溫州信徒的需要，專門在教堂裏為他們開辦了聚會活動。從這兩個例子來看，這些農民工信徒在進入城市之後，通過參與北京三自教會的活動，也逐漸發現這樣的教會並不適合他們，他們需要真正能在屬靈生命上給予他們餵養和關懷的教會，於是這類聚會形式也應運而生。

除了以上談到的幾種聚會點形式，在北京還出現了專門的農民工教會。以一個由主要由安徽、河南農民工信徒建立的教會系統為例，從二〇〇一年至今，在短短的不到五年時間內，他們已經由最初的三對夫婦發展到 27 個聚會點，會眾人數超過 1000。這個教會系統的成員，無論傳道人還是信徒，基本上都來自農村，受教育程度相對都比較低，在北京從事的行業也大都都是社會最底層的，相應他們的生活也都相當艱苦，所以他們的教會非常簡樸，在北京的城鄉結合部租用簡陋的民房作為聚會點。這樣的聚會形式和城市的三自教會與家庭聚會都有很大的差異，首先從物質條件上來說，比較艱苦；其次聚會的形式比較隨意，儘管信徒參與的程度較高，但聚會氣氛比較隨便，不夠嚴肅，也更為民間化；再次，這些農民工信徒整體上受教育程度不高，閱讀《聖經》和理解基督教的教義都有相當程度的困難，他們的信仰帶有很強的功利性和實用性。正因

為農民工信徒的特殊身分，因此教會講道的兩個重要主題就是世上的苦難和「天國子民」的榮耀。¹⁹總而言之，北京的農民工教會與鄉村教會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因為畢竟是在城市之中，所以他們的聚會形式和講道信息也都是針對農民工信徒在城市中的生活而來的，能引起這些農民工信徒的共鳴，也在一定程度上為這些農民工信徒提供了生命上的關懷和牧養。正因為如此，有學者就認為「那些專門面對農民工群體的新型城市教會才是真正滿足這些進城的鄉村基督徒的有效渠道。」²⁰

總之，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農民工信徒這一特殊的群體，他們雙重邊緣化的身分值得我們關注。他們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中國基督教所面臨的一個巨大問題，充滿着機遇和挑戰。

作者電郵地址：ajh6570@sohu.com（艾菊紅）

rjbjuang@hotmail.com（黃劍波）

19. 劉琪，〈農民工教會調查報告〉（未刊稿）。

20. 同上。

Strangers in the Metropolitan Cities: the Religious and Social Life of the Christian Migrant Workers

Al Juhong

Ph.D.,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UANG Jianbo

Ph.D.,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Christian migrant workers who rushed in the cities for a liv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re experiencing great changes in their lives and beliefs as well. To some extent, they are strangers in the margins of the metropolitan cities. Based on our investigation on Christian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we could tell that they are facing challenges of difficulties in transition. Wandering outside the urban church, meeting points for the migrant worker believers came out spontaneously. And the migrant worker churches newly planted are forms of their reactions for meeting their spiritual needs in the urban lives.